

## 引 论

民族识别是指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达到一律平等，从而调动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承认各兄弟民族的存在，并且还须知道各民族的民族名称。所以，就有必要进行民族识别，去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族别问题，进而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服务。因此，民族识别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后的一项自觉工作。

如果说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自觉的，那么，自从中国历史上民族产生的时候起，便有不自觉的，自发的民族识别。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一般来说是在原始社会解体时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形成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族共同体仍在不断地分化、融合、重新组合。民族一经形成，就有对民族情况的记述，在中国最早的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对民族的记述。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夷(尸)、狄、戎、蛮、土方、鬼方等一些对民族的称呼。这些便是最早的、自发的民族识别。

西周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共同体不断迁徙，经济文化频繁交流，在民族识别中出现了‘夏’与‘夷’的对应观念。因此，《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文中对民族的识别已经具有了现代民族识别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南蛮和东夷存在

着“不火食者”，表示生食的情况很多，生产发展落后，生活习俗是“被发文身”“雕题交趾”北狄和西戎存在着“不粒食者”，表示以牧畜产品为饮食来源，以游牧为主。

在《淮南子·坠形训》中甚至还从体质分类的角度对华夏四周的各民族加以识别。《淮南子·坠形训》载：“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毗，……早壮而夭，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倮修，颈印行，……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冰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翦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蠢愚；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从民族的体型特征进而谈到民族性格，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强调了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

秦王朝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在封建帝国内包含着众多的民族，加之汉民族本身也逐渐成熟，各民族的交往增加，这就客观上要求需对民族进行识别。系统地（尽管仍然处于自发阶段）对民族加以识别的是司马迁，他开始给兄弟民族撰写列传，如《史记·匈奴列传》就详细地记载了匈奴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阶级关系、习惯法、政治制度，而且还对与匈奴近邻的胡、氏、羌、月氏、大夏、乌孙等作了严格的族属区别，不似过去再统而呼之北狄、西戎了。当然，最具典型的例子当为《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夷”各族的识别。《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东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焉、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皆氏类也。”从这段大家常见常用的史料，可看到中国民族识别已有一些自觉的萌

芽。司马迁首先承认每个民族都是各有自己特点的客观存在实体，此民族和彼民族的区别是由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来区别的。

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后，其后的诸多史书皆宗其例，整个二十四史除《陈书》、《北齐书》外，都有少数民族专传，尽管各书立传范围不同，详略有别，划分原则亦有异，但一些重要民族都能大体识别其脉络。现概列如下：

《史记》有：《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

《汉书》有：《匈奴传》（上下）、《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上下）。

《后汉书》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

《三国志·魏书》有：《乌丸传》、《鲜卑传》、《东夷传》。

《晋书》则首次明确提出“四夷传”，其有：《东夷传》、《西戎传》、《南蛮传》、《北狄传》（按，不光有匈奴一族）。此外，《晋书》还将兄弟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另立《载记》论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

《宋书》有：《索虏传》（将编头发辫子的北方民族列入）、《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氐胡》。

《梁书》有：《海南诸国传》、《东夷传》、《西北诸戎传》。

《魏书》列传八十八载东北民族，列传八十九载西北、西南、东南民族。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故《魏书》的民族识别特别详细，在列传九十中就列了六十个民族共同体或“城郭国家”的名称。列传九十一载北方民族。

《南齐书》有：《魏虏传》、《蛮传》、《东南夷传》、《芮芮虏传》、《河南传》（吐谷浑氏）、《氐传》、《羌传》。

《周书》有：《异域传》（上下），其传上记东北、东部、东南地区的民族，传下以载西部民族为主。

《隋书》则严格按方位载,有:《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

《北史》卷九十四载东北、北方、东方海岛的民族 卷九十五载“南蛮”及东南各族 卷九十六载西部各族 而将西域七十五个民族或“城郭诸国”列在卷九十七 北方民族为卷九十八 由于突厥为当时最强大的北方民族,故在卷九十九载突厥,为了将突厥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反映出来,又再列《突厥传》、《西突厥传》、《铁勒传》。

《南史》有:《夷貊传》(上下)。

《新唐书》有:《突厥传》(上下)、《吐蕃传》(上下)、《回鹘传》(上下)、《沙陀传》、《北狄传》、《东夷传》、《西域传》(上下)、《南蛮传》(上下)。

《旧唐书》有:《突厥传》(上下)、《回纥传》、《吐蕃传》(上下)、《南蛮西南夷传》、《西戎传》、《东夷列传》、《北狄传》。

《新五代史》将兄弟民族放在附录中,专列“四夷附录”一二三。

《旧五代史》则将之列为《外国传》一二。

《宋史》有:《外国传》一至八,《蛮夷传》一至四。

《辽史》只有《高丽传》、《西夏传》。

《金史》亦然,有《西夏传》、《高丽传》。

《元史》有《外夷传》。

《明史》有《外国传》、《西域传》。但在《土司传》中亦有大量有关民族识别的材料。

从民族识别的角度看,各民族史传大多都讲述了民族成分、分布区域、文化习俗、语言特点,包含着许多民族识别的原则与方法。尽管如此,民族史传中对许多问题混淆不清,加之作者站在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故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之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中国历史上所谓“严华夷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用夏变夷”的主张,就难以十分客观地了解认识各民族的特

点。

第二，无论是羁縻统治还是土司制度、分而治之，都使各族的自然分化与融合因为王朝政治下的政区划分因素影响而日趋复杂。

第三，由于历代统治者及封建史家的民族歧视态度，就使他们对几千年来中国复杂的民族情况难以有客观的认识，常常表现出一种主观歧视色彩。

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古代民族识别进行研究便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故本书的研究目的表现为：首先，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单独创造的，而是由许多已经消失和正在发展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以达到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维护祖国统一，实事求是地结合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特点，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其次，对古代中国民族进行识别，可以给民族历史研究和解决一些现实民族问题提供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把民族发展的地域作为空间范围，把王朝存在先后作为时间顺序，以历史文献为主，民间传说、考古学、语言学材料为辅；把这些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古代民族的物质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作为识别的重要依据。

在结构上，皆从旧石器时代为起点，以近现代民族的形成作为终点，目的在于说明：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现在的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 第一章 东北地区的民族识别

### 第一节 先秦时期东北的民族识别

#### 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以金牛山文化和庙后山遗址为代表。金牛山文化发现于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一个洞穴的下部堆积中；庙后山位于辽宁省本溪市东南，也是一处洞穴遗址。地质时代均为中更新世，金牛山文化稍早，庙后山遗址则处于中更新世稍晚时期。两处都有梅氏犀、巨河狸、硕猕猴的化石，说明当时这一带的气候与华北地区相同，温暖而湿润。

金牛山文化和庙后山遗址均以石片石器为主。制作工艺比较原始，类型简单，都以刮削器为主。两处遗存的石器，不但在种类、形式上与北京人文化有相似之处，而且使用垂直砸击法加工脉石英石片和采用一面加工的技术，也是北京人文化中常见的。在两处的洞穴堆积中都发现了夹有烧骨、烧石的灰烬层，庙后山还有明显的灰堆。这都说明东北地区的远古人类也和北京人一样会用火、管火。在金牛山发现了人类化石，有较完整的头骨、脊椎骨、肋骨、髌骨、尺骨等五十余件；在庙后山也发现两颗人牙化石，保存较好的一颗系一成人下臼齿。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只发现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鸽子洞一处，从发现的遗物来看，人们以狩猎为主。

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多。辽宁省有凌源县西八间房地点、锦县沈家台地点、海域县小孤山遗址以及建平人化石；吉林省有榆树县周家油坊地点和安图县的安图人化石；黑龙江省有哈尔滨市顾乡屯地点和呼玛十八站地点。

西八间房旧石器地点位于大凌河右岸的第一阶地上。出土石制品四十九件，以‘琢背小刀’数量最多，而‘琢背小刀’则是华北地区下川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小孤山遗址中除有大量石器外，还有骨针、鱼叉以及用动物牙齿做成的装饰品，制作法与华北山顶洞人的很相似。

这一时期还开始出现具有细石器特征的石制品，其类型和工艺与华北地区的下川文化和虎头梁地点的同类石器很相近。

金牛山文化与庙后山遗址的发现，不仅说明了东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就有人类生活，还表明这里与华北地区在文化因素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是多元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些晚期遗址中发现的具有细石器传统的石制品，显然是本地区新石器时代十分发达的细石器工艺的先驱。而其类别、形制和加工方法与华北地区同类遗存的许多一致性又说明，起源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这时已向北传播到了松辽平原。<sup>①</sup>

## 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及其族属

东北地区比较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在辽宁中部和东部分别有新乐文化和小珠山遗存，黑龙江东部和西部分别有新开流文化和昂昂溪遗存。

新乐文化以沈阳新乐遗址下层为代表，目前仅知分布在沈阳

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前 5300 至前 4800 年。在新乐发现有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一座。生产工具中,细石器约占全部石器的一半。细石器中的长身镞、石钻,以及磨制的长三角形、横断面呈六边形的石镞,打制的石铲、石网坠和石磨盘、石磨棒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器物。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以竖“之”字形线纹(也称弧线纹)和弦纹为显著特色,器型主要是一种大口筒形罐。从发现的掘土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看,当时已有定居的原始农业;出土大量的石镞和网坠,表明渔猎经济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新乐文化与旅顺、大连地区小珠山一期遗存的部分陶器有相似之处,两者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小珠山遗存因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得名。分布在辽宁东部地区。小珠山遗址的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又分别称为一、二、三期,代表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小珠山一期遗存,在长海县的柳条沟东山,上马石(下层)、清化宫、新金县塔寺屯等遗址也有发现。上马石遗址的一座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近九平方米。这一时期的石器以打制的为主,磨制石器只有石斧一种。陶器多呈黑褐色,绝大多数压印竖“之”字形线纹,主要是一种直口筒形罐。动物遗骸有狗、鹿和大量的贝壳,说明当时既有原始农业,也有渔猎相伴。

小珠山二期遗存有了较大的发展。房址也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面积比前一个时期宽大。定居的房址和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表明有原始农业;从出土的猪骨、狗骨和泥塑陶猪来看,当时已饲养家畜。大量的石镞、网坠以及鹿、獐、海贝则表明渔猎有一定比重。

小珠山三期遗存中,房址已有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居住面为红烧土硬面,柱洞底还垫有础石。石器大多数是磨制,以直背弧刃双孔石刀、双斜肩厚体石斧、阶脊形有段石镞、穿孔石铲最有特点。已发现炭化粟,同样有从事渔猎的遗物。



新开流文化中细石器数量多,骨器角器种类复杂,有鱼镖、鱼叉、鱼卡、鱼钩,缺乏农业工具,可见当时捕鱼业的兴盛,经济生活显然以渔猎为主。

昂昂溪遗存分布在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嫩江流域以及吉林省西部,从已发现的遗物看,仍然以渔猎经济为主。<sup>②</sup>

以上对东北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情况作了大致的勾勒。从民族的角度看,到新石器时期,东北地区的三大民族集团,即东北地区东南部的秽貊集团,东北地区西部今内蒙古东部和与今吉林、辽宁交界一线的东胡集团,黑龙江省东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肃慎集团已经渐次开始形成。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文化上曾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大都以红褐色陶器为主,绝大多数陶器上都压印竖“之”字形线纹,几乎都有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式民居。但也有差异,即南部的人们共同体以农业生产为主,辅之以渔猎,而北部地区的则侧重于渔猎经济。

### 三、历史典籍中对东北古代民族的记载

夏朝时期的民族群体被称为‘鸟夷’。《史记·夏本纪》载:‘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这儿讲夏禹的治水活动,影响远及‘鸟夷’地区。皮服鸟夷居住的冀州范围很广,包括后来的冀、并、幽三州,皮服鸟夷分布区为冀州东北部靠海地区。关于其族属《史记·夏本纪·集解》载:‘郑玄曰:‘鸟夷,东(北)[方]之民,(赋)[博]食鸟兽者’。”

《史记·夏本纪·正义》又载:‘《括地志》云:‘靺鞨国,古肃慎也,在京东北万里已下,东及北各抵大海。其国南有白山,鸟兽草木皆白。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至接九梯。养豕,食

肉,衣其皮……’。’从《集解》和《正义》来看,乌夷即后来肃慎民族群体,是史书中所记载的东北地区最早的民族群体。文中所言的“白山”当为今长白山,而且他们的穴居形式与考古遗存同,故乌夷为肃慎民族群体之先民无疑。

商朝时期,史书中追记的东北民族仍然是肃慎集团的。《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载商汤建国之初,命令符娄贡献鞞、鲋、鲛盾等物品。此“符娄”即汉代的“挹娄”,当属东北肃慎集团的民族群体之一。

到了周时,史书对肃慎的记载不绝。《史记》《五帝本纪》、《周本纪》、《孔子世家》及《周书·王会解》、《尚书·序》、《左传·昭公九年》、《国语·鲁语》、《家语·辨物篇》、《淮南子·原道训》、《说苑》等均有记载。关于肃慎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和以前相比更为明确。

《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杨伯峻先生注曰:“燕是北燕,都于今北京市,已为解放后考古发掘所证实。由北京往北,经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再沿大凌河至朝阳、北票,通向辽阔的东北地区,此一带为周初由燕去肃慎之重要通道。”《晋书·四夷传》也载:“肃慎氏在不咸山北。”不咸山即今长白山。

肃慎的经济特征是狩猎经济,其工具还为石器。《史记·孔子世家》载:“有隼集于陈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载:“《肃慎国记》云:‘肃慎,其地在夫余国东北,(河)[可]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劲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国方有此矢’。”文中所言石砮即石箭头。由于肃慎贡楛矢石砮,周时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伐东夷,息慎(肃慎之异写)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除肃慎外，周朝还有关于东胡的记载。《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东胡贡献的是黄熊。《山海经·海内西经》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大泽应为今达来诺尔，所以东胡分布区应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对此，孙进己先生认为：从考古上看，东胡一族分布在今西拉木伦河一带已有悠久的历史。对东胡的考古文化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诸地，这与东胡的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的时间是周初至战国，也与东胡活动时间相当。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有殉犬的习俗，与文献所载乌桓以犬殉葬相合。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遗址发现的铜板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与东胡各族“以髡头为轻便”相合。铜板的人物形象经鉴定属典型蒙古人种，与人们对东胡语言的研究认为属蒙古语族都相合。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是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富河文化的时间距今约五千三百年，它的文化特征为：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石器多大型的砍砸器，细石器较多，是一种游牧狩猎文化。这一文化的存在及其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渊源关系，证明了东胡的先民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的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sup>③</sup>

在肃慎的南边，燕国的东北部，有两个存在着近亲关系的民族群体秽和貊。《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向。”《诗经·韩奕》载：“溥彼韩城，燕师所究，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

貊又称为貉。《诗经·閟宫》载：“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貉。”《周礼·夏官》也载：“四夷、八蛮、七闽、八貉、五戎、六狄。”郑司农注曰：“北方曰貉狄。”

秽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群体，分布区在东北南部地区偏东，约在今吉林省及朝鲜半岛北部，是这一地区的土著。目前认为西团山的文化遗存为秽先民留下的。<sup>④</sup>后来渐渐融合为一个大的民族共

同体,统称为秽貊。《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北至孤竹、山戎、秽貊。”

## 第二节 秦汉时期东北的民族识别

### 一、肃慎系统的民族群体

肃慎系统的民族群体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东北部。这个系统中的各部各有自己的名称,但是,中原史家把若干语言文化习俗相近的人们共同体视为一个民族,把其中一个比较强大的部分的名称作为整个系统的称呼,而统称为肃慎。实际上,肃慎、挹娄、勿吉并非传统认为的是一脉相承发展来的,而是同一系统中的不同各部分。先秦时期,肃慎入贡中原,中原史家便把肃慎作为各部的统称。汉代挹娄与夫余相争,中原人从夫余处知道了挹娄,又以挹娄作为各部统称。《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接至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洁,作厕于中,环之而居。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余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

下面从民族识别的角度作一些分析。首先“挹娄,古肃慎之国

也”，并非能理解为挹娄是由肃慎发展而来。我个人认为挹娄与肃慎是近亲群体，已如前所言，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理解为同源异流的关系。因为在史籍中，挹娄与肃慎同时见于各传。《三国志·东夷列传》中虽无肃慎传而有挹娄传，但《三国志》中许多地方却只说肃慎而不言挹娄。《三国志·东夷传》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三国志·母丘俭传》载：“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景元三年（公元 262 年）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晋书·文帝纪》载：“景元三年，肃慎来献楛矢。”《宋书·孝武帝纪》载：“大明三年（公元 459 年），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弩。”《新唐书·渤海传》载：以肃慎故地置上京龙泉府，以挹娄故地置定理府、安边府。从上面可以看出，肃慎与挹娄二名同见于同一史书，其地理位置上亦各有不同，可见二者是同一近亲民族群体中的两个部分，并非由肃慎发展为挹娄。

其次，整个肃慎系统的各部共同都使用楛矢石弩，这是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参照后来各史书的记载，我们不能看出在民俗文化特征上肃慎与通常认为由挹娄发展成的勿吉也有不同之处。

婚俗：《晋书·肃慎传》载：“将娶嫁，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而《魏书·勿吉传》则载：“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乃为夫妇。”

葬俗：《晋书·肃慎传》载：“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就其上，以为死者之粮。”而《魏书·勿吉传》则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再次，从社会组织形式上看，还处在“无君长”的时代，即有近亲关系的各部尚未统一起来，还没有产生能使整个集团统一的政治力量，因此“其邑落各有大人”，即各部都有自己的政治首领。这样一来，哪个部分的势力大，便被中原史家所知晓，而见之于汉族史籍。

## 二、东胡系统的民族群体

东胡强盛的时候，其西有一个日渐强盛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瓠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瓠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由于东胡从一开始就轻视冒顿，没有防备，所以一遭到冒顿的攻击，就被打败，灭了东胡王，俘虏了东胡的许多民众和牲畜财产。东胡灭亡后，其民一分而三：一为鲜卑，二为乌桓，三是被俘部分加入匈奴。

### （一）鲜卑

鲜卑，最早见于《楚辞·大招》：“滂心绰态，姣丽施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宋人洪兴祖补注载：“鲜卑，衺带头也。”可见是一种饰物。

《汉书·匈奴传》又载：汉皇送匈奴单于“黄金犀毗一”。注孟康曰：“腰中大带也。”又张晏曰：“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颜师古注曰：“犀毗，胡带之钩后，亦曰鲜卑。”这儿，鲜卑仍然指饰品，但东胡人喜好饰之。因此我认为，东胡中喜饰犀毗这种饰

品的部分便被称为鲜卑，后来被匈奴打败，他们退居的山便叫鲜卑山，并非是因为住鲜卑山才叫鲜卑。《国语·晋语八》中也有关于鲜卑的记载，而且是一个人们共同体的称呼。《国语·晋语八》载：“宋之盟，楚人固请先歃。叔向谓赵文子曰：‘夫霸王之势，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赞君，而裨诸侯之阙，歃虽在后，诸侯将载之，何争于先？……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由此来看，鲜卑势单力弱，地位很低，和楚人一样没有资格参加盟誓，只能去看守火堆。从“鲜卑，东夷国”的注释来看，鲜卑确为东胡一部，东胡失败分散后，才开始独立见诸史籍。

鲜卑独立被史家立传是《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与中国通。……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鲜卑活动的中心在饶乐水即今西拉木伦河一带，最初只与乌桓相接而且是在乌桓东北边，因为《史记·货殖列传》载：“燕北邻乌桓、夫余。”可见鲜卑和燕不直接相邻，中间为乌桓。

在鲜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公元85—105年），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种击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九年（公元94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十三年（公元98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延平元年（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匈奴十万余落如果以每落

(按 落可理解为户)五人计,便有五十余万人,而且臣服于鲜卑,成为鲜卑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才会“匈奴余种自号鲜卑”。此后,鲜卑多次出击进攻东汉,分布区向西扩展,渐渐到达北方草原;鲜卑自身也由于匈奴余部的加入,而使民族成份多元化。

第二阶段:《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桓帝时(公元147——167年),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口,因吞之,遂孕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弃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馱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这时的分布区更加广大,西至西域东部,而且应有大批漠北民族纳入其统治之下,丁零族的一部分约在此时加入鲜卑。由于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统治的需要,檀石槐又对辖区作了相应的调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朝廷积患之(指鲜卑),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秽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值得一提的是,匈奴破东胡后俘虏去的部分东胡人,此时应当回归于鲜卑之中。

在以上两个发展阶段中,由于鲜卑与汉朝北方边郡为邻,往往南下掠夺,因此又有部分汉族融入鲜卑当中。《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熹平三年(公元175年)



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公元 177 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公元 178 年）夏，鲜卑寇三边。’可见有不少汉族被掠去，这些被掠去的汉人，当大部分融入鲜卑之中。另外，也有主动投向鲜卑的汉族。《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汉人逋逃，为之（鲜卑）谋主。”

综上，东汉后期之鲜卑，成份已较为复杂，虽名之鲜卑，实际上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民族群体，即以从东胡中分化出来的鲜卑为主体，同时也含有匈奴、汉族、丁零等。

## （二）乌桓（丸）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师，数百千落自为一部。’以上是对乌桓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的记载，看来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关于其民俗生活，《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大人有所招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纪。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辨。”

乌桓的发源地在辽东西北数千里的赤山，这赤山据张博泉先生考证在今克鲁伦河发源的肯特山。<sup>⑤</sup>《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俗贵兵死，斂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灵魂